

高僧传

现存最早、影响最大、最具权威的僧人传记开山之作
国内首次完整注释、白话译文、现存各版本强力校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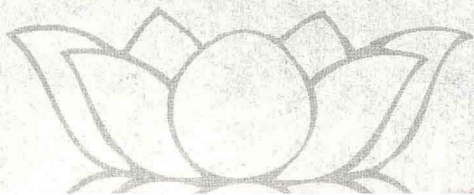
上

（梁）释慧皎 著

朱恒夫 王学钧 赵益 注译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高僧传



.....
(梁)释慧皎 著

朱恒夫 王学钧 赵益 注译
.....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导 读

一、《高僧传》产生的历史背景

据书史记载（按：据近来简牍竹册之考据所得，佛入中国之时日早在西汉初年，至于秦前是否已有印度僧人在中国境内，虽仍乏确证，但不能排除其可能性，因此，为避免于此处作不必要之争论，乃不以“佛入中国”为言），光武帝的儿子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后汉书·楚王英传》）。当时寺庙不多，其功用主要是为了满足西域、印度来华的僧侣或商人的宗教信仰，法律不允许中国人出家。在人们看来，佛与中国巫道之教中的神仙差不多，“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又以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佛身长一丈六尺，黄金色。项中佩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袁宏《后汉记》）。《弘明集》卷一描述得更为具体：“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也。”总之，佛教在东汉时期，仅被人们当做一种奇教异术来看待，由于翻译的经典较少，它在中国没能形成一种体系完备的宗教学说，加之它与儒家孝亲思想的较大距离，所以不为大众所接受。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以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经典，提出了有无、本末、动静的哲学范畴，论证在现象世界背后存在着真实的、永恒不变的、超言绝象的精神性本体——“道”或“无”。而玄学的盛行恰好为佛教的流布渗透提供了一个契机。以道安、慧远为首的佛教徒，利用玄学理论，来宣传佛教的般若学说。他们说，世俗所认识的和面对的一切对象，均为因缘和合，假而不实，唯有通过“般若”（智慧）对世俗认识的否定，体证真实的、超言绝象的“实相”“真如”“第一义谛”，才能觉悟解脱。世界的本质是“无”和“空”，万事万物是由一种气演化出来的。昙济在《七宗论》中介绍道安的观点说：“冥造之前，廓然而已。至于元气陶化，则群缘禀形，形虽资化，权化之本则出于自然。自然自尔，岂有造之者哉？由此而言，无在元化之先，空为众形之始，故谓本无。”这种思想与当时魏晋玄学中何晏、王



弼一派的贵无学说十分接近，迎合了上层社会所信奉的哲学思想的需要，于是迅速得到传播。

道安除了用玄学观点去理解、发挥佛教理论外，还对汉译佛经作了初步整理，写出了《综理众经目录》，并组织外来僧人译经。他为僧侣团体制定了应遵守的法规、仪式，为以后中国汉族地区的寺院制度打下了基础。慧远还提出了协调佛教与封建王权、佛法与名教关系的理论，缩小了儒佛之间的距离。他所宣传的人死后可以转生阿弥陀佛“净土”的信仰，对人们极具诱惑力。

西晋末年，特别是进入东晋十六国时期后，天下混乱，战争不断，哀鸿遍野，生灵涂炭。人们的生活朝不保夕，不堪重负。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幻想着从苦难中解脱出来，进入一个无忧无愁、充满欢乐的世界，于是欣然接受佛教关于极乐世界的宣传，精苦守戒，广造福业，希图获取一张通往极乐世界的门票。佛教便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下层，成为与普通群众关系最为紧密的一种宗教。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出于巩固政权与其他方面的原因，大都扶植佛教。因此，在这一时期，佛教在我国取得了牢不可破的地位。

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进一步的广泛传播。南朝情形据唐法琳《辨正论》卷三、唐道世《法苑珠林》（四部丛刊本）卷一二〇记载，宋有寺庙一千九百一十三所，僧民三万六千人；齐有寺庙二千零一十五所，僧民三万二千人；梁有寺庙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僧民八万二千七百人；陈有寺庙一千二百三十二所，僧民三万二千人。又据《开元释教录》卷五至卷七所载，宋译佛经四百六十五部七百一十七卷，齐为十二部三十三卷，梁为四十六部二百零一卷，陈为四十部一百三十三卷。佛教的善男信女的人数也是空前的。《高僧传》中常见到某些高僧的僧俗弟子有千万人之多，如卷八《法通传》说齐法通的弟子有七千多人。卷一一《释僧佑传》说梁代僧佑讲经时，“听众常七八百人”，“凡白黑门徒一万一千余人”。朝廷每当举行法会，成千上万的人听讲与参加仪式。北朝的佛教也是相当兴旺的，我们仅据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即可看出北朝佛教的盛况。该书的序介绍了北魏在洛阳盛建寺院的情形：

晋永嘉（公元307至313年）唯有寺四十二所，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云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锦绣，土被朱紫而已哉。

该书卷一又详细描写了洛阳永宁寺的宝塔：



……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刹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斛。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铎，复有铁锁（索）四道，引刹向浮图四角。锁上亦有金铎。铎大小如一石瓮子。浮图有九级，角角皆悬金铎，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铎。浮图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户皆朱漆。扉上各有五行金钉，合有五千四百枚。复有金环铺首，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目。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躯，中长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金织成像五躯，玉像二躯。作工奇巧，冠于当世。僧房楼观，一千余间。雕梁粉壁，青缯绮疏，难得而言……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闾浮所无也。极物（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

举国之人，崇佛至狂。至于寺庙宝塔，富丽堂皇，连游历诸国的西域和尚也骇叹不已。

至于寺庙、僧民、译经的数量，也毫不逊色于南朝。

南北朝佛教兴盛的原因约有三点：一是政治黑暗，此时基本上仍是门阀士族把持政权，他们占取了大量的社会财富，生活奢侈，独断专行。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非常激烈，经常引发改朝换代的战争，人民则饱受战争的苦难，而佛教正好为他们提供了寄放灵魂的安静之地。二是南北朝皇室成员大都奉佛，这给民众信仰佛教起了模范带头作用。梁武帝萧衍（公元502至549年在位）的信佛到了迷狂的程度，他优待僧侣，奖励佛教义学，对于那些从事佛教著述的名僧，给予很高的社会地位和优厚的生活待遇。他广建佛寺，盛造佛像，亲自敕建同泰、大爱敬、大智度、法王、仙窟和开善等寺院，这些寺院规模宏大，殿宇巍峨，雄伟壮观。他十分重视戒律，曾亲赴无碍殿受佛戒，法名冠达。他自己断酒肉，也不允许僧人破戒。他十分重视佛典的翻译和注疏。《梁书·武帝本纪》说他“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戊夜”。“尤长释典，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他曾四次舍身寺院，由朝廷和群臣以巨额金钱赎回。至于北朝许多皇帝，也崇信佛教。由于统治者以身作则，又采用许多手段进行倡导，大大提高了佛教的地位，使得一般民众风起响应。三是出家利益的驱动。许多寺院广占田地，僧尼享受免除徭役、不输租调的特权，“寸绢不输官库，升米不进公仓”（《广弘明集》卷二四陈陵《谏仁山深法师罢道书》），有的僧人还成了帝王将相的宾客，



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于是许多人便想削发为僧尼，去过没有家庭负担、没有徭役痛苦的出家生活。

当然，佛教势力的大肆扩张、僧尼寺院的激增与佛教教义对儒家思想的挑战，难免引发它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伦理观念的矛盾，排佛的议论与行为时常出现。但是，佛教走向兴盛、融合到中国文化中的趋势已是不可逆转的了。

二、《高僧传》之前的僧人传记

佛教能传入东土，并在东土盛行，主要得力于一大批具有献身精神的高僧。他们有的远离家乡，来华传教；有的长途跋涉，西行取经；有的穷经皓首，注疏经义；有的为了表现自己信仰的真诚，残体焚身。为了表彰他们在弘扬佛教的过程中作出的杰出贡献，也为了给僧人与信徒树立可以效法的榜样，后来的僧人便撰写了许多僧人的传记。在慧皎之前的僧人传记，著名的有下列十七种。

（一）《出三藏记集》，梁僧佑撰，也称《三藏记》、《僧佑录》、《录》，十五卷。全书分“撰缘记”“铭名录”“总经序”“述列传”四部分。“述列传”三卷，载历代译经者三十二人之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僧传，为后世修僧传体佛教史书直接继承。

（二）《名僧传》，梁宝唱撰。《名僧传》已佚，现存《名僧传抄》仅保留其一部分内容。据《名僧传抄》所载原书目录可知，全书分十八科，收有四百二十六人的传记。十八科的“科目”分别为：外国法师、神通弘教外国法师、高行中国法师、隐遁中国法师、中国法师、律师、外国禅师、中国禅师、神力、兼学苦节、感通苦节、遗身苦节、守素苦节、寻法出经苦节、造经像苦节、造塔寺苦节、导师、经师。由内容与分目来看，慧皎的《高僧传》受宝唱《名僧传》的影响很大，利用了《名僧传》的许多材料。《高僧传》正传二百五十七人之中与《名僧传》相同的有二百二十一人；附见二百四十四人之中与《名僧传》相同的达九十二人。当然，《高僧传》收录的僧人面比较窄，《名僧传抄》中的道韶、纳衣、法惠、道矫、昙副、法祥等人，都有略传，然《高僧传》却没有收录。《名僧传抄》保存了当时一些佛教学说，如卷三“三乘渐解实相事”“无神我事”；卷一八“礼法事”；附录“说处”中的卷一〇“庐山慧远习有宗事”、竺道生所立佛性论、观空不受报的说法等。

（三）《高逸沙门传》，竺法济撰，一卷。法济的老师道潜在《高僧传》卷四中有传。

（四）《僧传》，法安撰，五卷。慧皎《高僧传序》与《高僧传》所载的王曼颖



的信，皆批评他“止命志节一科”。

(五)《方传》，僧宝撰。《高僧传》卷八提到三个僧宝，不知何人为是。

(六)《江东名德传》，法进撰。王曼颖说该书“名博而未广”。慧皎序说：“法门、法进乃通撰论传，而辞事阙略，并皆互有繁简，出没成异，考之行事，未见其归。”

(七)《宣验记》，刘义庆撰，三十卷。该书已佚，鲁迅《古小说钩沉》辑了十六条，其中《康僧会传》是从《高僧传》中取材的，可见两书关系之密切。

(八)《幽冥录》，刘义庆撰，二十卷。《高僧传》取材该书甚多，竺法兰、安清、佛图澄传等多参考该书的记叙。

(九)《冥祥记》，王琰撰，十卷。《高僧传》取材本书较多，其传主有摄摩腾、康僧会、昙无竭、求那跋摩、朱士行、康法朗、支遁、于法开、竺法义、竺法汰、慧远、法安、慧严、慧义、僧含、道温、单道开、竺佛调、耆域、陀勒、(齐荆州)慧远、僧群、僧瑜、法相、竺昙盖、竺法纯、道同、慧进、慧达、僧洪等，共有三十人。

(十)《京师寺记》，昙宗撰，二卷。《高僧传》卷一三“唱导”中有传。

(十一)《感应传》，王廷秀撰，八卷。《高僧传序》云：“太原王廷秀《感应传》。”

(十二)《征应传》，朱君台撰，二卷。《高僧传序》云：“朱君台《征应传》……并傍出诸僧。”

(十三)《搜神录》，陶渊明撰，十卷。《高僧传序》云：“陶渊明《搜神录》，并傍出诸僧。”

(十四)《三宝记传》，齐竟陵王撰。竟陵王即萧子良(公元460至494年)，是六朝贵族中最虔敬敬佛的人。《高僧传》记叙了他和僧佑、玄畅、僧远等人的交往。慧皎说他的著述“或称佛史，或号僧史”，然批评它“既三宝共叙，辞旨相关，混滥难求，更为芜昧”。

(十五)《僧史》，王巾撰。《历代三宝记》卷一一载：“齐僧史十卷，司徒竟陵文宣王府记室王巾撰。”《高僧传》评价为：“意似该综，而文体未足。”

另外还有“各竞举一方，不通今古；务存一善，不及余行”的张孝秀《庐山僧传》和陆明霞的《沙门传》。

由此可见，在慧皎写作《高僧传》之前，僧人传记方面的著作已经很多，这为慧皎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与体例上的借鉴。可以说，没有这么多的参考著作，《高僧传》不一定能写成如今这样流传不息的佛教名著。



三、慧皎其人与《高僧传》的内容

唐道宣撰《续高僧传》卷六《梁会稽嘉祥寺释慧皎传》云：

释慧皎，未详氏族，会稽上虞人。学通内外，博训经律。住嘉祥寺，春夏弘法，秋冬著述，撰《涅槃义疏》十卷，及《梵网经疏》行世。又以唱公撰《名僧》颇多浮沉，因遂开例成广，著《高僧传》一十四卷……传成，通国传之，实为龟镜，文义名约，即世崇重。后不知所终。江表多有裴子野《高僧传》一帙十卷，文极省约，未极通鉴，故其差少。

《高僧传》卷一四末僧果的跋尾云：

右此传是会稽嘉祥寺释慧皎法师所撰。法师学通内外，精研经律……梁末承圣二年（公元553年），太岁癸酉，避侯景难，来至湓城，少时讲说。甲戌岁二月舍化，春秋五十有八。江州僧正慧恭为首经，营葬于庐山禅阁寺墓。时龙光寺释僧果同避难在山，遇见时事，聊记之云耳。

由这两条材料，我们可以将慧皎勾勒出一个大概的轮廓：生于公元497年（齐明帝建武四年），死于公元554年（梁末承圣三年）。为会稽上虞人，对佛学、儒学等有较高的造诣，尤其对佛教的经、律，有广博的知识。居住嘉祥寺，除了撰写过《高僧传》外，还著有《涅槃义疏》十卷与《梵网经疏》。

《高僧传》卷一四《序录》，包括作者的自序、全书目录，并附录了作者与文士王曼颖的往返书信两篇和僧果的题记。我们可以从这些材料中了解到作者写作此书的构想、框架以及所参考的书目。

慧皎写作《高僧传》的动机在其《序录》中说得很清楚，因为他不满意已有的僧传，认为有的褒赞过当，有的叙事空洞，有的删减其事致使不少高僧的“抗迹之奇，多所遗削”，并批评他们不写离世远俗的高僧。

于是，他广泛地搜集资料，“尝以暇日，遇览群作。辄搜检杂录数十余家，及晋宋齐梁春秋书史、秦赵燕凉荒朝伪历、地理杂篇、孤文片记，并博諮故老，广访先达，校其有无，取其同异”。采访极广，务求信实，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写成《高僧传》一书。

《高僧传》为什么取“高”字，而不袭用宝唱等人所作僧传的“名”字呢？慧皎在《序录》中也作了解释：

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纪；高而不名，则备今录。故省“名”



音，代以“高”字。

世人所说的“名僧”，品行不一定高尚。而有道德学问的高僧如果隐遁于深谷密林之中，就不一定有名。而品行卑劣的吹牛拍马之辈，虽知名于当世，但却不能谓之高僧，故是书有理由不收录他们，因而将该书称为《高僧传》。

《高僧传》共有十四卷，所载时间起自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到梁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前后四百五十三年。正传为二百五十七人，附见二百四十四人。全书按照所录僧人突出的品行业绩分为十科。

一为“译经”，三卷，介绍了从东汉至齐代翻译佛经的僧人三十五人的生平事迹。其中多为天竺僧，也有少数西域僧、汉僧。读者能够从该科中了解到不同时期的译经情况、译经种类和译经风格的变化。

二为“义解”，五卷，该科有从晋到梁一百一十位学僧的传记，其中多为汉僧，也有少数西域僧或印度僧，如康僧渊、释昙翼等，这部分内容表现了各代学僧的学识、学说、著作，对儒道玄的态度，僧人与上层社会的关系，由此亦能了解到佛教义学在士大夫阶层传播发展和佛教中土化的演进情况。

三为“神异”，二卷，此科介绍佛僧的神异表现与具有的奇门异术。“如慧则之感香，能致痼疾消疗。史宗之过渔梁，乃令潜鳞得命。白足临刃不伤，遗法为之更始。保志分身圆户，帝王以之加信”。

四为“习禅”，记述了能够杳寂禅定的僧人二十一人 的事迹。

五为“明律”，与“习禅”合为一卷，列传的十三位僧人，皆是精于律学，并能够树立戒范的。

六为“亡身”，所记叙的十一位僧人，为供养佛像或为造福业而做烛自焚。

七为“诵经”，与“亡身”合为一卷，所载二十一位僧人，皆精习《法华》等经，出口能诵。

八为“兴福”，十四人，为想方设法筹款建塔造像者。

九为“经师”，此科所记皆是善于讽诵佛经、吟咏歌赞、巧于音律的僧人，共为十一人。

十为“唱导”，与“兴福”“经师”二科合为一卷。所载僧人擅长于宣唱经文，引导忏悔，共为十人。

前八科论赞俱备，后二科有论无赞。一科之“论”，实为这一门类的意义、源流概述与重要的僧人、事象之评论。如“义解”科说“义解”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正确的释义，会言伤其旨，意失其真。作者对竺潜、支遁、道安、慧远等人的义解评价道：“使夫慧日余晖，重光千载之下；香土遗芬，再馥阎浮之地。”对于佛教的



一些概念、修行方式等在论中也有浅白的阐述，如在论中对禅定、唱导、经转都有清楚的说明。

四、《高僧传》的学术意义

一部佛教史，实际上是由经、律、论三藏与僧人传记所构成。由经、律、论可知佛教的哲学思想、修持方法，与各个时期流派的理论，而僧人传记则鲜活地表现了佛教在某一个时期的风貌、统治者与佛教的关系、僧徒的操行、老百姓对佛教的态度、寺院的经济与生活等。没有了僧人的传记，佛教史则缺少了佛教发展的轨迹，好比抽去了一个人的骨架。因此说，慧皎的《高僧传》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从东汉到梁时的佛教主体——僧人的活动情况，使我们能够全面地了解佛教东进之后的宣传、融合、占据哲学领域中显要位置的历史。可以说，《高僧传》是一把打开东汉到南北朝佛教世界大门的钥匙。

诚如上文所说，在慧皎之前或同时，也产生过一些传记，但它们对有些僧人的介绍，不如《高僧传》完备。如东晋高僧竺法深，《世说新语》中五六次提到他。然刘孝标注说：“法深不知其俗姓，盖衣冠之胤也。”其实，《高僧传》卷四就有详细的记载，云：

竺法潜，字法深，姓王，琅玕人，晋丞相武昌郡公敦之弟也。年十八出家，事中州刘元真为师……至年二十四，讲《法华》、《大品》，既蕴深解，复能善说……支遁遣使求买仰山之侧沃洲小岭，欲为幽栖之处，潜答云：“欲来辄给，岂闻巢、由买山而隐？”……以晋宁康二年（公元374年）卒于山馆，春秋八十有九。

一生记述清楚，可补《世说》之阙。

《高僧传》在志人志怪小说风发之时问世，毫无疑问，它在取材、表现上都受了六朝小说的影响：追求奇异、卓立的美学风格，而言辞又趋向散体。可以说，《高僧传》的许多内容可以当做小说来看。如《高僧传》卷一〇“神异下”梁京师释保志：

齐武帝谓其惑众，收驻建康。明旦人见其入市，还检狱中，志犹在焉。志语狱吏：“门外有两舆食来，金钵盛饭，汝可取之。”既而齐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并送食饷志，果如其言。建康令吕文显以事闻武帝，帝即迎入，居之后堂。一时屏除内宴，志亦随众出。既而景阳山上，犹有一志，与七僧俱。帝怒遣推检，失所在。阎吏启云：“志久出在省，方以墨涂其身。”

行为诡异，分身有术，让我们想起了小说《三国演义》二十九回中的于吉。这



些内容毫无疑问同于虚构的小说家言，又如卷一三“兴福”晋京师安乐寺释慧受：

初立一小屋，每夕复梦见一青龙从南方来，化为刹柱。受将沙弥试至新亭江寻觅，乃见一长木随流来下。受曰：“必是吾所梦见者也。”于是雇人牵上，竖立为刹，架以一层。道俗竞集，咸叹神异。

慧受营造福业，感动上苍，青龙化木，以作寺刹。读者读到这样的内容，自然会从神异的故事中获得美感享受。

《高僧传》还可补充史书的不完备之处。如王曼颖此人，于史无传。《梁书》卷二二《南平王伟传》提到他，云：“太原王曼颖卒，家贫无以殓，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儿对革号诉。革曰：‘建安王当知，必为营理。’言未讫而伟使至，给其丧事，得周济焉。”由这段记载可知，王曼颖乃当时知名人士，故能与江革为友，为郡王所知，曼颖卒时，江革称萧伟为建安王，而萧伟是天监元年封的建安王，十七年改封的南平王，似曼颖卒于天监十七年前。然《高僧传》卷末附有王曼颖与慧皎往复书信各一封，由此我们知道慧皎撰《高僧传》时曾与王曼颖商榷体例，书成后又请他掩疵利病。慧皎评价他“学兼孔释，解贯玄儒”。又《高僧传》成书于梁武帝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其时曼颖应该在世。由他在复信中称“不见旬日，穷情已劳，扶力此白，以代诉尽”，似当时已卧病不起。由此又可见，“南平王伟传”在曼颖死时江革仍称萧伟为建安王，当是刚封南平王不久，人们习惯用旧封呼之，曼颖实死于天监十八年后。

《高僧传》由于体例合理，文辞婉约，尊重史实，所说有据，故在当时就被赞为“不刊之笔”。后世的《续高僧传》、《宋高僧传》皆模范是书，且都取得了成功。

五、《高僧传》的著作与版本

《高僧传》问世以后，常被佛教目录书籍著录，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它在历代被重视的程度与流行情况。以下列出主要的著录书籍与著录内容。

《众经目录》，隋沙门法经等撰，其卷六云：“《高僧传》十五卷，释慧皎撰。”

《开皇三宝录》，又称《历代三宝贝记》，隋费长房撰，其卷一一云：“《高僧传》，十四卷。”

《隋书·经籍志》，唐长孙无忌等撰，其“杂撰类”云：“《高僧传》，十四卷，释僧佑撰。”此书显然是张冠李戴了。为此，陈垣先生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作了辨明：“一、何以知此书非僧佑撰？曰僧佑未闻著此书。宝唱为僧佑弟子，此书果僧佑撰，似不应列宝唱书之后。二、何以知此书为慧皎撰？曰此书卷数与皎书



合。校书本为不满‘名僧’二字而作，今此书列名僧传后，故知为校书。三、何以知古本隋志不误？曰两唐志于唐以前书多同隋志。今唐志皆作《高僧传》十四卷，慧皎传，而无僧佑《高僧传》，以此知古本隋志不误。四、何以慧皎能误为僧佑？曰慧皎与僧佑皆梁僧。僧佑行辈高，名器盛，著述存者较多，慧皎所著，存者仅此书，故易误为佑也。”

《大唐内典录》，唐道宣撰，其卷四云：“《高僧传》十四卷，并目录。”

《法苑珠林》，唐道世撰，其卷一〇〇云：“《高僧传》十四卷，并目录。”

《郡斋读书志》，宋晁公武撰，其卷九“释书类”云：“《高僧传》六卷，右萧梁僧惠敏撰，分译经、义解两门……又《高僧传》十四卷。右萧梁僧慧皎撰。”晁公武所记的两部《高僧传》，当是一部，惠敏就是慧皎。

《通志》，宋郑樵撰，其书云：“《高僧传》十四卷，僧慧皎撰。”

之后，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等书皆予著录，著录的内容基本一样。现存的《高僧传》版本有：

（一）明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径山寂照庵刻径山藏本，《高僧传》十三卷。

（二）碕砂藏本。

（三）清抄本，清孙星衍、丁丙跋。

（四）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金陵刻经处刻本，《高僧传》初集十五卷首一卷。

（五）海山仙馆丛书，收《高僧传》十三卷。

本书选用了碕砂藏本为底本，并参照了大正藏本、弘教藏本与金陵刻经处本。只要碕砂藏本能够读通、无碍文意，一般从碕砂藏本。碕砂藏本有明显错误之处，则在注释中指出它本相应的字、词，并提出我们的看法。

《高僧传》是一部一千多年前的佛学著作，对于普通的读者来说，阅读它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我们在注释时尽量做到详细，译文则尽量做到通俗明了。但由于是三个人合著，故行文的风格、注释的详略、语言的表述，不完全一致。本书第一至第五卷由南京大学赵益教授撰写，第六至第十一卷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王学钧教授撰写，第十二至第十四卷及目录由本人撰写，并作最后之统稿。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难免有错误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朱恒夫

1999年12月于金陵淡斋

出品人：惠西平

总策划：宋亚萍

策划编辑：李向晨 李婷晓

责任编辑：李婷晓 李向晨

封面设计：高洪亮 姚立华



目 录

卷 一

译经上 正传十五人 附见二十人

汉洛阳白马寺摄摩腾	1
汉洛阳白马寺竺法兰	4
汉洛阳安清	6
汉洛阳支娄迦谶 竺佛朔 安玄 严佛调 支曜 康巨 康孟详	16
魏洛阳昙柯迦罗 康僧铠 昙帝 帛延	19
魏吴建业建初寺康僧会 支谦	23
魏吴武昌维祇难 法立 法巨	35
晋长安竺昙摩罗刹(竺法护) 聂承远 聂道真	37
晋长安帛远 帛法祚 卫士度	41
晋建康建初寺帛尸梨蜜	47
晋长安僧伽跋澄 佛图罗刹	54
晋长安昙摩难提 赵正	56
晋庐山僧伽提婆 僧伽罗叉	60
晋长安竺佛念	64
晋江陵辛寺昙摩耶舍 竺法度	66

卷 二

译经中 正传七人 附见六人

晋长安鸠摩罗什	72
---------------	----



晋长安弗若多罗	97
晋长安县摩流支	99
晋寿春石碣寺卑摩罗叉	102
晋长安佛陀耶舍	104
晋京师道场寺佛驮跋陀罗	111
晋河西县无谶 道进 安阳侯 道普 法盛 法维 僧表	121

卷三

译经下 正传十三人 附见四人

宋江陵辛寺释法显	132
宋黄龙释昙无竭	139
宋建康龙光寺佛驮什	143
宋河西浮陀跋摩	144
宋京师枳园寺释智严	145
宋六合山释宝云	150
宋京师祇洹寺求那跋摩	152
宋京师奉诚寺僧伽跋摩	167
宋上定林寺昙摩蜜多	169
宋京兆释智猛	173
宋京师道林寺曇良耶舍 僧迦达多 僧伽罗多哆	177
宋京师中兴寺求那跋陀罗 阿那摩低	179
齐建康正观寺求那毗地 僧伽婆罗	187

卷四

义解一 正传十四人 附见二十二人

晋洛阳朱士行 竺叔兰 无罗叉	197
晋淮阳支孝龙	199
晋豫章山康僧渊 康法畅 支敏度	201

晋高邑竺法雅 毗浮 昙相 昙习	203
晋中山康法朗 令韶	204
晋敦煌竺法乘 竺法行 竺法存	206
晋剡东仰山竺法潜 竺法友 竺法蕴 康法识 竺法济	208
晋剡沃洲山支遁 支法虔 竺法仰	213
晋剡山于法兰 竺法兴 支法渊 于法道	226
晋剡白山于法开 于法威	228
晋敦煌于道邃	231
晋剡葛岷山竺法崇 道宝	233
晋始宁山竺法义	234
晋东莞竺僧度 竺慧超	236

卷 五

义解二 正传十五人 附见九人

晋长空五级寺释道安 王嘉	240
晋蒲坂释法和	254
晋泰山昆仑岩竺僧朗 支僧敦	255
晋京师瓦官寺竺法汰 昙壹 昙貳	257
晋飞龙山释僧光 道护	261
晋荆州上明寺竺僧辅	262
晋京师瓦官寺竺僧敷	263
晋荆州长沙寺释昙翼 僧卫	265
晋荆州长沙寺释法遇	268
晋荆州上明寺释昙徽	269
晋长安覆舟山释道立	270
晋长沙寺释昙戒	272
晋潜青山竺法旷	273
晋吴虎丘东山寺竺道壹 帛道猷 道宝	275
晋山阴嘉祥寺释慧虔 净严	279



卷六

义解三 正传十三人 附见十四人

晋庐山释慧远	281
晋蜀龙渊寺释慧持 慧岩 僧恭 道泓 昙兰	325
晋庐山释慧永 僧融	331
晋庐山释僧济	334
晋新阳释法安	336
晋庐山释昙邕	338
晋吴台寺释道祖 慧要 昙顺 昙洗 法幽 道恒 道授	341
晋长安大寺释僧碧 弘觉	343
晋彭城郡释道融	346
晋长安释昙影	349
晋长安释僧睿 僧楷	351
晋长安释道恒 道标	356
晋长安释僧肇	362

卷七

义解四 正传三十二人 附见四十五人

宋京师龙光寺竺道生 宝林 法宝 慧生	379
宋京师乌衣寺释慧睿	386
宋京师东安寺释慧严 法智	389
宋京师道场寺释慧观 僧馥 法业	401
宋京师祇洹寺释慧义 僧睿	404
宋京师彭城寺释道渊 慧琳	409
宋京师彭城寺释僧弼	411
宋东阿释慧静	412
宋京师祇洹寺释僧苞 法和	413